

山軍通南
史料農民起義

管勁丞編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 通 軍 山
農 民 起 义 史 料
管 劲 丞 編 著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內容介紹： 本書是一本敘述太平天国革命

時期江苏南通軍山農民起義的地方史料。書中對南通
軍山農民起義發生的原因、經過，及其和當時江南太平
天國軍的關係等等，都作了詳盡的考證。

南通軍山農民起義史料

管勁丞編著

*

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七號

新华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华印刷厂印

*

开本 787×1092 索1/32 印張 3 5/8 字數 69,000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統一書號： 11100·23

定 价：(6)三 角

前　　言

一八六三年，江苏南通（当时叫通州）軍山地区曾經發生过一次農民起义。領導这次起义的人是盛廣大和黃朝颺。这次農民起义，后来虽然因为走漏消息，遭到反动統治者的破坏而失敗了，但是我們今天把这一段歷史事实考查出來，还是有它的意義的。

过去，对于这一次的農民起义，南通地区的人是把它作为“黃朝颺造反”、“捉齋道人”之类的歷史掌故來傳說的。至于它的歷史原委和歷史意义，一向少有人去研究。現在，距离軍山農民起义的那个时代是越过越远，当日目击其事者已經不存在了；听得故老相傳而能詳細复述其事的人也愈來愈少了；至于早先記述下來的有关文字資料，本來就不多，如今經過了几十年，有些已經散失掉，不易再找到了。这一切就給研究这一地方歷史事件的工作帶來了困难。

一九五一年某月，我在揚州會見李俊民同志。在偶然的談話中，談起了通州軍山農民起义事件。他正苦于文献不足，而我所知的却更少，当时沒有能够深入地談下去。但我經此啓發，也就关心到这些文献，并企圖搜集一些，以提供研究參考。及至回來，又詳細翻檢通州志，于旧鈔的一条之外，找到另一条，另外并看到馮激的“瞻云樓外史”，又約略地听到还有

某些記載，但著作名称和著作者的介紹，往往語焉不詳；比較說得具体些的，不是摸不到掌握資料的所在，就是事实上并不符所說。因此，搜集資料工作一直无法進行，搜集所得，既普通而又簡略，远不足以說明問題；于是只好擱置下來，等待有所發現。

到全國展开对于武訓傳的討論時，我为了學習，要搜集一些學習參考資料，在这一过程中，就很自然地聯想到那久被擱置下來的关于南通軍山農民起义史料的搜集工作，隨即在這方面作了多方面的嘗試。我做歷史研究工作，有这样的經驗：做任何歷史研究，都必須掌握一定分量的資料；掌握的資料沒有达到一定分量，或是資料沒有經過一定程度的考証，是不容易把問題搞清楚的。后來看到袁水拍等同志經過实地調查寫出來的“武訓歷史調查記”，我得到了很大的啓發，認識到綜合“口口相傳”的歷史資料，有时比較通过文字組織的記載要更朴素，更完整，更可靠些。因而又想到搜集軍山農民起义的文献，也可以运用他們的方法。当然我曾顧慮到这一事件發生的年代較远，起义領導者黃朝颺的居住地址還沒有能够确定，掌握的文献資料过少等等困难；可是我一經展开初步采訪，便發覺有关的一类傳說相當廣泛，有綫索可以多搜集到一些資料。只是事情已經过去九十余年，如今目击其事者已經不易找到罢了。

以后，我又重新找到了些綫索，并擴展了搜集面，自己有了較多的了解，也漸漸掌握了些直接間接的資料；可是資料仍然不很够，仍然不足以提供解决几个主要問題。直到一九五

三年，我被調到南通博物館工作，恰巧館里收到了當時華東方面轉來的一大批太平天國史料文物，準備作一次較大規模的太平天國史料展出，同時並準備把軍山農民起義史料作為南通地方性的有關史料參加展出。我這才加緊進一步地來做這個調查工作。這時我應該感謝黃渠臣先生的指教和幫助，是他使我這一工作能够得到不斷地順利開展的。他是講崇明話的南通人，博洽通海掌故，編纂過海門縣志；對於軍山農民起義事件，有特多的了解，並且掌握着不少的資料。主要由於他的指教和幫助，我又找到更多的線索，看到了一向沒有被人注意過的記載，訪問了一些比較熟悉這個史料的人士；從而編成功一個有關資料的詳細目錄，經常地去進行搜集。這一段過程是很曲折的。最初我從某處聽說劉伯英做的筆記中有“黃朝颺案”一條，曾載在“通海新報”。但早年與劉伯英一同做編輯工作的人說不記得這事了。遍查現存的舊“通海新報”分年合訂本又查不到。問到黃先生，他說曾經從報上剪下來，大約還在那裡，卻又說不一定找得到；結果是他終於把那張旧報的剪片從書卷中翻出來了。這一下，我才初次看到根據鄉區傳說寫成的一篇完整記載。“鶴砭軒質言”是當時通州人戴蓮芬的筆記。問了久居南通的老輩，多不知有戴蓮芬其人，更不知其著作。我們雖然知道有一個“進步書局”的小字石印本，但圖書館里沒有，後來又是黃先生替我找了出來。我於是又看到一篇根據城區市民傳說寫成的完整記載。以後，顧引之先生告訴我，他曾在一部通州某人的詩集里，看見一大段有關黃朝颺事件的夾注。人名書名他都忘掉，只說是從城

北楊姓借來的；去訪問楊姓，又猜不着他所指是借閱的哪一部書。通過展轉推求與訪問，才知道這就是劉長華的“槐雲閣詩鈔”；但這部詩鈔却很難找。結果也還是黃先生替我向一位丁先生借了來。一看，他的記載系根據當時目擊的情形而以半官方的立場寫下來的；雖也完整，但很簡略。不幾天，我又從王守銘先生那里聽到了劉長華還在他的另一種著作里詳細地記下有關黃朝颺事件的情況。他說劉遺有一冊筆記稿本，他說不出書名，只說明是在抗戰期中從李伯蘊那里借來看的；而李伯蘊已于前年去世，據說書籍已散失了。那麼，我惟有試向李伯蘊的二弟李仲璞先生那里進行了解，看那稿本筆記是否仍有存在的可能。結果意外得很，成績極好；不過不是找到了原稿本，而是發現了李仲璞先生早就关心搜集這一史料。李先生除了鈔得同治三年上諭一條，州志“秩官志下”一條，戴蓮芬“勸砭軒質言”一條，並摘鈔馮激“曉云樓外史”兩條外，還鈔有劉長華“梓里述聞”中的兩條。原來它就出于王守銘所指的那稿本筆記上。果然敘述遠較“槐雲閣詩鈔”的附誌為詳，而且還有專記盛廣大的一條，這是其他各家所不及的。李先生又從李鴻章“朋僚函稿”鈔得有關黃朝颺事件的書札四通，參考的價值很大；他的這些資料，對於我們解釋當時清朝統治者對黃朝颺事件的處理先嚴急、後寬弛的內在原因，確是非常有幫助的。李先生綜合所鈔資料成為“齋匪之案”一篇，篇中並介紹了黃朝颺曾刊行“偽書”以及盛廣大“行術”的故事。我于聞悉“梓里述聞”已不在李家僅僅與李先生交換了一番意見之後，承他欣然地把資料的鈔件借給了我。陳堅“持庵憶語”一條，先

是陳叔吟先生告訴我的；隨後他替我到陳家去借，沒有；又去信到旅外的本書持有者某先生那裡替我把它借了來。這方面最後的收穫，是馮翰飛先生把所藏的顧曾沐“希愷齋筆記”從南京郵遞借給我。顧著過什麼筆記，我經一再訪問，方才得知；馮先生收藏南通人著述甚富，家鄉學界中人全都曉得；我在上海曾去拜訪他，因他已到南京工作未晤。我去拜訪，主要為的向他作些請教，却也料想不到顧筆記稿本會保存在他那裡。這回是我和黃淳伯通信，才和他聯繫上，承他特地把書寄了來。我就是如此地展轉訪問並獲得上述資料的；至此，我已差不多掌握到已知的全部資料了。

一九五四年春天，中共南通市委宣傳部穆烜同志通過錢嘯秋先生的介紹來看我。原來他從“光明日報”史學附刊上看到龐芬介紹常熟悟迟老人柯某的“漏網喟魚集”，其中引有有關軍山農民起義的敘述。他知道了我在搜集這方面的資料，隨即把登載龐文的“光明日報”借給我，並且告訴我他從他祖母、母親和幾個鄰居那裡得來的一些傳說。接着復幾次見訪，催促並鼓勵我加速把史事採訪所得寫成專篇。這時博物館里舉行展覽會的計劃，早因館將結束決定中止，若不是得到這位青年人的熱情鼓勵和催促，說不定我會再拖一些時間才着手做這個工作。

我的研究計劃，初步是擬將彙鈔搜集到的所有資料加以對照，然後選取若干主要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並通過考証，得出一定的結論，再動手寫成綱要，以提供別人作為參考。到了我進入研究與考証工作的階段，又重新感覺到文獻不足，即如

黃朝璽是不是農民成份，他家究竟住在通州南郊哪里等等問題，都缺乏足夠資料來作定論。因此，我需要繼續發現更多的新資料；而新的資料來源，除去實地採訪外，將不能再企圖發現多少文字記載。我於是費了好幾個月的業余時間，在南通市區，以及郊區狼山、軍山和新港鎮等處訪問了許多年長的人。在一次我往上海的時候，也有目的地走訪了幾位旅滬的南通人士。平時和人閑談中，我也決不放棄每一個機會，常常談論到這件事。通過這些活動，我常常得到豫料所不及的收穫。在我訪問過的一百多人中，十分之九的人都知道有南通軍山農民起義這回事。三分之二的人分別提供了同異程度不一的各種傳說；還有三分之一的人僅僅知道有“捉齋道人”、“門口挂魚肉”之類的常談。這些人中雖然也不免有些牽強附會的說法，但只居極少數。綜合我所採訪到的資料，內容相當豐富；有些可以作為文字記載的參考，有些可以糾正文字記載的錯誤，又有些可以補足文字記載所不及。

我通過了上述的廣泛採訪，同時還了解到不少的間接資料，例如劉長華家住在三衙墩附近，當時他是住在家里；戴蓮芬寫“鶴砭軒質言”時的落泊情況和後來筆記的所以印行；盛廣大在西門外、南大街賣藥的地点與軍山附近當時地形之類。這些材料雖則像是和史事本身關係不大，或近于瑣碎，但用以肯定史料的可靠性，用于分析研究史料的工作，却有一定的幫助。再如有關歷史問題解釋的一些資料，像當時沿江一帶農民生產及生活情況，當時狼山鎮標綠營的組織情況，以及起義前夕和當時的團練督辦有過如何的更動等等，我更特別多

方地向熟悉地方掌故的老輩請教過。此外，我还參考了一些關於太平天國軍和捻軍的史書方志，乃至於某些有關的文集年譜之類，這才使得我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分析研究與考証的工作。但由于局限於個人的政治認識和歷史知識水平，局限於只是憑借着不甚充分完備的資料，所以我只可能把研究所得寫成一篇紀事本末體似的概述，並把它同經過分析研究與考証而分別寫定的二十篇專篇合編成一个小冊子出版。希望通過這一個小冊子的出版，能够得到更多的指教與幫助。

最後，在這本小冊子出版之際，飲水思源，謹續述年來調查研究這一史料的經過，以為前言；並借以向對我有過指教和幫助的先生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管勁丞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于南通

目 錄

前 言.....	(1)
概 述.....	(1)
一 盛廣大和黃朝颺	(2)
二 准备起义	(5)
三 反动統治者的破坏和起义的失敗	(9)
考 証.....	(21)
一 起义的年月和日期	(21)
二 起义的根据地	(24)
三 起义的領導者之一——盛廣大	(26)
四 起义的領導者之二——黃朝颺	(32)
五 起义農民的宗教淵源	(39)
六 起义農民的組織發展	(43)
七 起义農民的軍事联系	(47)
八 狼山鎮标参加起义的武弁	(53)
九 起义陣營的兩個和尚	(56)
一〇 起义的事先准备	(59)
一一 起义失敗后的被牺牲者	(63)
一二 起义消息破露的种种傳說	(67)

一三	破坏起义的告密者与策动告密者	(71)
一四	鎮压農民起义的主要官紳(一)	(74)
一五	鎮压農民起义的主要官紳(二)	(78)
一六	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磨擦	(81)
一七	所謂名冊的抄獲与燒毀	(83)
一八	農民起义的文献(一)	(88)
一九	農民起义的文献(二)	(91)
二〇	有关軍山農民起义的傳說	(96)
后 記		(101)

概 述

当太平天国末期，天京（南京）被圍攻到兵臨城下的时候，
〔1〕常熟縣城因守將駱國忠突然叛变而失守，接着太倉、昆山
相繼淪陷，江陰、無錫等處軍事不斷失利，使蘇州面臨到陷落
前夕。〔2〕正当這方面太平天國軍有必要計劃轉移到江北對岸
以改變局勢的時候，和江陰、常熟隔江相望的通州軍山發生了
農民起義接應太平軍北伐事件。〔3〕只因為這一帶農民向來缺
乏武裝暴動的經驗，組織不够嚴密，先期消息破露，結果沒有
等到大舉襲取州城，就遭受到清朝反動軍隊和地主惡霸團練的
聯合武裝鎮壓。起義功敗垂成，領導起義的農民領袖被殺
四十余人。多年團結起來的通海地區的農民失掉了領導者之
後，便被迫瓦解，沒有能夠重新團結，再度起義。由於這一失敗，
使得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派留在蘇、常地區的部將企圖脫免包圍，轉移到敵後作戰的全盤計劃，在這一方面遭到了
致命打擊；使得正在魯、豫、皖一帶發展壯大，並已初步滲透到
蘇北里下河的捻黨潛在力量，也遭到了致命的打擊。〔4〕也由於
這一失敗，滋長了淮軍軍閥李鴻章的反動氣焰，讓他儲備了
後來剿滅東捻軍的武裝資本，並相對地加速了蘇州乃至於天
京的淪陷。〔5〕

一 盛廣大和黃朝颺

軍山農民起義接應太平天國軍北伐事件，發生于太平天國天京陷落的前一年，癸未十三年，即清同治二年癸亥，亦即公元一八六三年。起義的領導者是盛廣大和黃朝颺。

盛廣大，揚州人。他是后天教東漸的傳教者，帶着捻軍使命來播散種子，打下埋伏。據說他是“捻軍哨目”，與清、淮、揚、泰會黨都有聯繫，不時往來通、泰兩地，聚黨計議，探聽消息。他時常化裝成江湖走方郎中，撐着一把遮陽大布傘，挂着“盛廣大”紅布招牌，在通州城廂及附近各鎮，行醫賣藥；而實際上是在搞秘密傳教工作。他秘密進行着一系列的活動，是以發展后天教為由，通過當地有威望的農民領袖，組織有一定革命要求的窮苦農民群眾，為捻黨在蘇北的東南角上預早潛伏下後備力量。他还經常在通州城廂附近秘密聯繫着不少大小衙門的班房吏役和綠營的弁目兵勇，把他們團結組織在已經發展的后天教周圍。復在此外圍聯繫了不少城市貧民，分派他們替后天教進行宣傳與偵察活動。盛廣大在這裡，也像皖北捻黨一樣，經常與太平天國軍保持着一定的聯繫，直接和大江南岸江陰、常熟一帶的太平天國軍互通聲氣，作為太平軍移師北伐的內應。^[6]

另一起義領導者黃朝颺，家住通州軍山西南、狼山正南的老山港外三号圩。他的上代是崇明人，來這裡居住已久，可是不改口音，還說崇明話。原來，這一帶農民的祖上，都是自清康熙雍正以來，從崇明移居過來的。他們的祖上用自己的勞

動，冒着風險，就不毛之地的江灘上挑泥筑岸，圩成了良田。可是他們不能完全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州官不許他們直接報領灘地乃至成田完糧；他們用自己血汗圩成的良田，只能被視為暫時占有。他們的土地所有權得不到官廳的承認與保障，于是地主惡霸們就有机可乘了，地主惡霸們借着代行出名報領，從而騙取了農民集體拿出來的資金，在申請書上用上自己的名義，向官廳出價報領了灘地；及至成田以後，依然沿用自己的戶名登記完糧。他們不破鉗，不費力，憑空取得了土地所有權，被稱為糧戶；而費錢勞力、圩筑成田的農民倒變成佃戶。這一帶農田，俗稱“沙田”。農民們世代在這裡佃種，人口加多而田不加多，一般總是感覺人多田少；農作以外，必要搞些副業才活得下去。加之田在江邊，每年夏秋間得受台風襲擊：小則損害田禾，減少收穫；大則引起潮災，沖坍江岸，淹沒或卷掉房屋；有些田還會坍入江心。這裡土地本來是肥沃的，但因農民經不起連續的自然災害與來自多方面的殘酷剝削，既然无力適當施肥，又只是種植單一作物，破壞了土壤結構；因而就使得土地日見其瘠，收穫量日見其低，農民經濟日見其困窘。到了太平天國在天京建都以後，江北通、如、海、泰等州縣，一直沒有獲得解放，由於當地地主惡霸等辦反動團練武裝，農民的負擔就更加重了；像所謂“就地籌餉”，“殷富捐輸”，一眨眼便轉嫁到農民身上。當時沿江的農家丁壯不是被拉去當團丁，就是被抽去巡邏港口；這就幾乎削弱了每一農家的勞動力，直接妨礙了他們的生產。加之江上交通斷絕，又進一步妨礙了他們在江上和到江南去經營副業生產。所以，這一帶農民，比之

一般農民有更多更深的痛苦；宜乎他們更先自發地要求互相團結，要求發動反抗。他們老早就有了一些以誦經念佛作為團結形式的散漫的小規模的結社，及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即公元一八六二年秋天，后天教東漸，盛廣大就把這些散漫的小規模結社——一些無名的經堂變成了互相有聯繫、內部有組織的半公開的大團體，稱為“后天教”或“后天會”。〔7〕當時黃朝鑑正同那些沿江一帶說崇明話的農民一樣，是一個佃戶。他為人正派厚道，循着崇明語地區的風氣，學過一些武功；種田種得多些，生計比較寬裕些。就實際情況說，是一個中農的成分。由於他對公共利益肯帶頭，在群眾中起著主導作用，因此有相當的威望；每逢群眾要求共同對付殘酷剝削與嚴重壓迫的時候，常推舉他出來代表農民說話。他也像那里的廣大農民一樣，早就吃素念經；又因為他有些文化水平，那就更容易被人家擁護成領袖人物。盛廣大東來發展後天教的時候，很自然地首先發展了他，把他培養成通海地區的領導者。自後，他們的宗教活動，繼續有了更快的發展，不滿一年工夫，臨到軍山起義的前夕，他們的教徒已達四五千人，（或說上萬人，甚至說几萬人。）發展的面相當廣，東到海門，西直到泰興。〔8〕

〔1〕據曾國藩奏議卷七“攻克雨花台偽城疏”、“江面肅清疏”所記時日推算
太平天国失守雨花台，在天曆癸卯十三年五月一日，即陰曆清同治二年
四月二十七日。失守天京浦口，在五月十三日，即陰曆五月初十日。失
守下關、草鞋峽、燕子磯，在五月十六、十七日，即陰曆五月十三、十四
日。失守九洑洲，在五月十八日，即陰曆五月十五日。這以後曾復派軍
進扎孝陵衛，以合金陵之圍，此見同書“近日軍情片”。

〔2〕據錢勸“吳中平寇記”，駱國忠叛變獻城降敵，系在壬戌十二年十二月六

日，即清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反攻到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前后八十天。太倉失守系在癸未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即清同治三年三月十五日。昆山失守在四月十八日，即陰曆四月十四日。

[3]詳見考証六、考証七。

[4]據劉長華“梓里述聞”“盛光大”條：“光大居淮東上游，素充义勇頭目；外與清淮諸官紳交接往來，而內實與揚城、靖江、泰通諸匪聯為心腹，不時往來通泰兩地，聚黨計議、探聽消息，又私與朝陽訂盟。蓋以通居海角，一經事起，伊即隨地亂，得以肆行無忌也”。是盛光大已在這一角做了全面布置，只等軍山起義接應太平天國軍北渡，然后隨在響應。在清軍方面，也察覺到這一情況，所以李鴻章復吳棠的信中，特別提到“里下河民氣浮動”。

[5]蘇州失守，亦系守將叛變所致。叛將鄒云官、伍貴文、汪有為等合謀刺殺蘇王譚紹光，開門向清軍納降，事在十月二十三日，即陰曆十月二十五日。至于天京淪陷，則在甲子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即清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6]詳見考証三。

[7]詳見考証五。

[8]詳見考証四、考証六。

二 准備起義

這以前，當太平天國癸好[1]三年至庚申十年，即清咸丰三年至十年，亦即公元一八五三至一八六〇年的七八年中，通州境內，屢遭災荒。到了庚申十年，即一八六〇年，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大軍在江南的勝利，聲威也震撼着這一角。[2]通州和江陰、常熟雖然只有一江之隔，可是江上交通，被地主惡霸們的反動團練武裝扼斷，局面實際掌握在一個大地主惡霸